

# 台湾地区马王堆文化研究的论题与进路

王超

(湖南 长沙 410208)

自马王堆汉墓发掘以来,其丰富的出土器物 and 文献资料使两岸学术界眼前为之一亮,成为中国田野考古史上的“空前成绩”<sup>[1]</sup>,亦被称为“人间瑰宝”<sup>[2]</sup>。自此,台湾地区有关马王堆文化之研究逐步兴盛。1975年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出版专书《帛书老子》,1977年出版《帛书战国策》成为马王堆文化研究较早的资料著录。之后,越来越多的专业研究人员投身马王堆文化研究之中,推动了研究视域和方法的不断拓宽和更新,使马王堆文化研究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

## 一、台湾地区马王堆文化研究的论题

随着中国文化研究的范式嬗变与观念演进,台湾地区马王堆文化研究逐渐由释文译注延伸到研究论著,从帛书扩展到帛画、葬具等各领域,从马王堆汉墓本身扩展到汉文化及其现代意义,成为马王堆文化研究的重要分支。

### 1. 由释文译注延伸到研究论著

自马王堆汉墓大量珍贵文物整理出土以来,台湾地区的一些学者即敏锐的意识到这些历史资料将为研究提供新的素材,既可校勘今本古籍之不足,又可对照研究传世文献的流传过程,还可以有确据地进行疑古、释古<sup>[3]</sup>。1974年,《文物》杂志发表《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出版《老子甲本及卷前古佚书》和《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开启了对马王堆帛书研究的先河。1975年,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出版了专书《帛书老

子》,1977年又出版《帛书战国策》,成为马王堆文化研究较早的资料著录。

随后,对出土帛书的释文译注成为研究关注的重点,注、疏、笺、诂等多种注释方法的运用推动了对古籍文献的深入诠释。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参照简帛本最新修订版)》(台湾商务印书馆,2007)、严灵峰《马王堆帛书易经斟理》(文史哲出版社,1994)、叶程义《帛书老子校刘师培〈老子斟补〉疏证》(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郑良树《老子新校》(台湾学生书局,1997)、陈锡勇《老子校正》(台湾里仁书局,2000)。

在释文译注的基础上,研究逐渐由对文本的研读、诠释演进到运用实证方法展开的考据、校勘。徐复观作《帛书老子所反映出的若干问题》,对帛书《老子》和今本《老子》大略的作了比勘。严灵峰出版《马王堆帛书老子试探》。邱德修《楚帛书〈老子〉德先道后问题蠡测》一文对帛书《老子》上下二经与今本不同次第的问题提出见解。有关研究专著还包括:严灵峰《马王堆帛书易经初步研究》(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郑良树《战国策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6)、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林清源《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台北艺文印书馆,2004)、徐富昌《简帛典籍异文恻探》(台北国家出版社,2006)等。

作者:王超,湖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2. 由帛书扩展到帛画、葬具等领域

台湾地区对马王堆文化的研究兴趣最初主要集中在《老子》、《周易》之上,其出发点在于校勘今本古籍之不足。随着帛书中其他文献以及帛画、漆器、地形图等公布,研究的对象逐渐由《老子》甲乙本及佚书扩展到《战国纵横家书》、《刑德》等,由帛书扩展到帛画、葬具等。

### (1) 帛书研究:从黄老学说扩展至其他

透过台湾华艺线上图书馆,以“帛书”为关键词可以检索到92篇论文,以“马王堆”为关键词可以检索到69篇论文<sup>[4]</sup>。而从这些文献发表的时间特征来看,早期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老子》甲乙本、佚书及《周易》之上,随后才扩展到其他文献。早期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关于《老子》甲乙本及佚书的:邱德修《楚帛书〈老子〉德先道后问题蠡测》(《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77年第11期)、郑良树《论帛书本〈老子〉》(《书目季刊》,1979年第3期)。关于《周易》及卷后佚书的文献主要有:严灵峰《马王堆帛书易经初步研究自序》(《东方杂志》,1980年第8期)、陈道生《三易和帛书卦序表征稿》(《哲学与文化》,1981)、严灵峰《马王堆帛书易经六十四卦的重卦和卦序问题》(《东方杂志》,1985)、黄沛荣《论马王堆帛书易经之卦序》(《书目季刊》,1985年第4期)、吕沛铭《汉初帛书〈周易〉八卦研究》(《中华易学》,1986年第2期)。

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关的研究成果更是不断涌现。其中,关于《老子》甲乙本及佚书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郭梨华《〈经法〉中‘形——名’思想探源》(《哲学与文化》,1998年第1期)、郭梨华《简、帛〈五行〉的礼乐考述》(《哲学论集》,1999年第32期)、陈丽桂《从郭店竹简〈五行〉检视帛书〈五行〉说文对经文的依违情况》(《哲学与文化》,1999年第5期)、陈德和《淮南道家与黄老道家的对比性考察——〈淮南子〉性格的再标定》(《鹅湖月刊》,1999年第290期)、谢君直《〈道原〉中的道论》(《鹅湖月刊》,2000年第296期)、宋光宇、陈国

镇、苏莉华《从道原经看先秦道家思想对信息的了解》(《佛学与科学》,2000年第1期)、林清源《马王堆帛书〈十大经〉题解》(《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3年第22期)、戴琰璋《儒家慎独说的解读》(《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3年第22期)、黄耀堃《“无为则无不治”及〈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的传承》(《先秦两汉学术》,2004年第2期)、陈丽桂《从出土简帛文献看战国楚道家的道论及其相关问题——以帛书〈道原〉、〈太一生水〉与〈巨先〉为核心》(《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6年第29期)、张成秋《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残卷之评鉴》(《语文学报》,2006年第13期)、陈清茂《“马王堆黄老帛书四种”书名相关问题探讨》(《兴大人文学报》,2008年第40期)、王晓波《兼儒墨、合名法——〈尸子〉的哲学思想及其论辩》(《国立台湾大学哲学论评》,2008年第36期)、徐富昌《竹简〈文子〉与传世本〈文子〉异文研究》(《台大中文学报》,2009年第30期)、郭梨华《出土文献中儒、道“天——人”关系论的异同》(《哲学与文化》,2009年第12期)、蔡璧名《“守静督”与“缘督以为经”——一条体现〈老〉、〈庄〉之学的身体技术》(《台大中文学报》,2011年第34期)、黄汉光《〈淮南子〉是道家吗?》(《鹅湖月刊》,2011年第434期)、范丽梅《释“弁”与“变”——简帛〈五行〉多层次的身心书写》(《汉学研究》,2014年第1期)、马耘《帛书〈道原〉“迴同大虚”解义》(《台北大学中文学报》,2014年第16期)等。

关于《周易》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曾美云《帛书〈易说〉思想探析——兼论“子曰”及其相关问题》(《语文学报》,2004年第11期)、李宗焜《数字卦与阴阳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6期)、黄沛荣《近代出土文物在〈易〉学研究上的意义》(《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2010年第20期)、陈清茂《马王堆帛书〈系辞〉“象”作“马”字现象探讨》(《中山人文学报》,2010年第29期)、邱丰饶《“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章考辨》(《止善》,2013年第12期)、江柏萱《马王堆帛书〈周易〉

书法风格特色分析》(《书画艺术学刊》2013年第14期)、杨静刚《论先秦时代可能有一篇专门讲占筮的解〈易〉之作》(《东华汉学》,2013年第18期)等。

90年代以后,对马王堆出土帛书其他方面的研究,如《战国纵横家书》、《刑德》等开始崭露头角。有关《战国纵横家书》的论文主要有:王忠仁《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文字特性分析》(《书画艺术学刊》2008年第5期)、王忠仁《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文字结体之造形特性》(《书画艺术学刊》2009年第7期)等;有关《刑德》篇的论文主要包括:张培瑜、张健《马王堆汉墓帛书刑德篇与干支纪年》(《华冈文科学报》2002年第25期)、陈峻志《水创生观下的太岁数术——数术规律之提出及“咸池为太岁”之辨析》(《兴大人文学报》2014年第52期)。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关于方术的研究,包括:李建民《明堂与阴阳——以〈五十二病方〉“灸其泰阴泰阳”为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9年第3期)、黎德安、马继兴、郑金生《古代中医黄疸疾病之思维》(《台湾中医医学杂志》2002年第2期)、黎德安《阴黄考》(《中医药研究论丛》2002年第1期)、林文建、吴明珠《经络研究的进展》(《中国中医临床医学杂志》2004年第4期)、孙嘉鸿《道教导引行气术探微》(《嘉南学报》(人文类)2005年第31期)、王志楣《从物理学到形上学:导引术与庄子思想》(《人文集刊》2007年第5期)、孙嘉鸿《道教辟谷食气术初探》(《嘉南学报》(人文类)2007年第33期)、陆耘、田雨《马王堆出土的房中著作对今人的启示》(《历史月刊》2008年第246期)、陈惠玲《〈马王堆汉墓简帛〉古医书“脉”字考——兼论原始脉观》(《先秦两汉学术》2008年第10期)、罗明宇《〈伤寒论〉望诊的相关论述和临床应用》(《北市中医会刊》2010年第4期)、黄丽君《防闲托守宫——汉唐之间以守宫为方的验淫术》(《史原》2012年第3期)、邓佩玲《从北大医简“一沔一傅”谈简帛医药文献所见“洒”与“傅”》(《中医药杂志》2013年第1

期)等。

(2)其他出土器物研究:由帛书扩展到帛画、墓葬具等

除了帛书研究,近年来台湾地区马王堆汉墓研究的对象范围开始不断拓宽,不再局限于帛书之上,而是由帛书扩展到帛画、墓葬具等,着力挖掘这些出土器物的文化意涵。其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关于帛画的,如邢义田《“太一生水”、“太一出行”与“太一坐”:读郭店简、马王堆帛画和定边、靖边汉墓壁画的联想》(《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11年第30期)、鲁瑞菁《论马王堆一号汉墓T形帛画的安魂护灵功用》(《先秦两汉学术》2012年第18期)、黄儒宣《马王堆〈辟兵图〉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4年第6期)等。关于墓葬具的研究,如鲁瑞菁《马王堆一号墓与砂子塘墓葬具之“璧婴”图像研究》(《静宜中文学报》2012年第1期)等。

## 二、台湾地区马王堆文化研究的进路

马王堆文化本身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价值,涉及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哲学、法学、军事学、文书档案学、书法学、民俗学、经济学、中医药学、数学等多学科领域,因此,对马王堆文化的研究进路不是闭合和单一的,而是综合而多元的,不同的研究视域与多学科研究方法之间相互渗透、相得益彰,共同构筑了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具体来看,台湾地区马王堆文化研究的视野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 1.以考据为基础的古文献学研究

王国维曾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sup>[5]</sup>。从台湾地区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古文献学研究的重点主要聚焦于久已失传的佚书之上,包括《老子》甲乙本及佚书、《易说》等。

早在1979年,郑良树先生即指出,帛书《老子》的出土将会影响老子哲学思想的新探讨。并认为,今本《老子》有衍文、夺文、错字,并且句读有误,帛书可澄清被误解之文字并

可解决聚讼多时之文字<sup>[6]</sup>。之后,台湾地区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呈现出两个特点:

一方面,学者们积极参与到有关的学术论争中,通过辩驳考证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例如,林清源汇整了曾经引发学者争论的《十大经》议题。在经过重新评估后,得出结论认为:其一、《十大经》总共十五章;其二、《十A经》的A字即是“大”字;其三、标题语“十A经”,其实包含两个不同层次的标题语,前半段是该篇末章的章题,后半段则是全篇的篇题<sup>[7]</sup>。陈清茂分析了现有的黄老帛书四种命名之不足,并以“马王堆黄老帛书四种”称之,认为马王堆黄老帛书四种可视为战国末期、汉初黄老之学的重要著作,就目前可供分析的资料而论,并不能证明其为《汉书·艺文志》所录之《黄帝四经》<sup>[8]</sup>。李宗焯在全面搜集有关数字卦材料基础上,对目前几乎“定于一尊”的数字卦逐译为《周易》的易卦说法重新加以检讨。经过仔细论证,认为将数字卦译为《周易》易卦局限性非常大,与相关文献如《左传》、《国语》等的易例也不相应;所有在数字卦与《周易》关系上的推演,主观成份居多。数字卦与易卦,是并存的两个不同的系统,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sup>[9]</sup>。

另一方面,学者们依循自己的学术专长寻找小的切口展开深入研究。例如,郭梨华对《老子》乙本卷前之帛文《经法》中的“形一名”思想进行了研究。在探源中,发现“形一名”显现出齐国地域文化色彩,其出现是相应“礼—乐”制度所面临的崩溃<sup>[10]</sup>。郭梨华还对帛书《五行》的“礼、乐”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五行》中的五行是否曾经配合金木水火土而导致荀子的批判不可确知,不过,荀子批评思孟五行,可能在于《五行》中的礼乐观<sup>[11]</sup>。范丽梅尝试结合语言文字、思想内涵、社会背景等面向的语境,说明《五行》与《五行说》中“颜色容貌温弁”的释读。认为“弁”字具有文彩交错、明着之义,在《五行》脉络中表述君子于礼的社会背景下,其身心气修养臻至完美、形体仪态有如玉色温润,呈现文彩斐然的样子。此是上承

《论语》“文质彬彬”所提出的类似修养口诀,以个体的身心修养来落实礼的最大意义<sup>[12]</sup>。马耘指出将《道原》中“迥同大虚”之“虚”解义为世界宇宙论意义或存有论意义之某种事实状态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认为《道原》“恒无之初,迥同大虚”等语,疑指人心志之某种排除主观意念构作后之状态,而与外在世界之“事实”无涉<sup>[13]</sup>。曾美云指出,就思想角度而言,《易说》基本上属儒家学派之作,然而其中不免杂有异家思想,在概念与界说方面颇类黄老,甚至搀杂了阴阳家、法家乃至纵横家思想,反映出当时各家融合的时代特点。至于《易说》“子曰”,五篇《易说》之“子”,身份实非一致。《二三子问》、《易之义》、《要》中的“子曰”指孔子,而《繆和》、《昭力》中的“子曰”则指文中的傅《易》经师,与孔子无关。唯《易说》中确定为“(孔)子曰”之文,未必尽出孔子真传,不排除有后学附会已意或假托立言情形<sup>[14]</sup>。陈清茂对马王堆帛书《系辞》“象”作“马”字现象进行了探讨,认为今本《系辞》32处的“象”字,帛书《系辞》全用“马”字的现象,既非讹误字,也非避讳字,最合理的推论,应是别有所指的异文。面对帛书《系辞》、今本《系辞》的“马”、“象”字歧异现象,不能理所当然地将帛书的“马”字视为今本“象”字的“异文”。帛书本“象”字作“马”字的现象,正好反映出一个存在汉代与通行本内容差别较大的《系辞》传本系统。在帛书传承的诠释脉络中,“马”字可能就是“正文”,对《易》理的诠释,可提供新的思维<sup>[15]</sup>。

## 2. 围绕文字结体形态展开的艺术学研究

江柏萱认为《周易》依字体、书风判断应为汉文帝时期所书,已出现成熟的汉隶特征。马王堆帛书中篆意较浓的书风(如《老子》甲本、《战国纵横家书》、《五十二病方》等)字形、线条多圆转,可视为承袭《青川木牍》、《睡虎地秦简》等“秦篆”之后古隶发展的重要环节,而较为接近汉隶的一类,并显示出诸多成熟汉隶的特征,二者在文字结构上并无多大差异,而马王堆帛书的字体与书风,证明了秦系文字在字体演变上的承袭与递变,使我们了



解马王堆帛书在文字隶变过程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sup>[16]</sup>。王忠仁从六国古文的遗绪、文字隶变的情形、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及错别字等六个方面分析了帛书的文字特性,认为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是一篇极具代表性的古隶,其抄写年代应在刘邦卒年(公元前195年)之后,惠帝卒年(前188年)之前,正值隶变激烈的时期,结构上隶变的痕迹非常明显<sup>[17]</sup>。又从单字空间安排的变化、重心与取势、联系与呼应、单字结构的变化、单字结构的动力形式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战国纵横家书》的文字结体造形特性。认为笔道纵横,方圆并举,舒展俊逸,波则内敛,磔则外张,一种雄毅豪放的气势跃动于字里行间,是件价值很高的书法艺术品<sup>[18]</sup>。李宪专认为依书写习惯、形体特色、用笔特征等进行分析比较,马王堆帛书医书卷至少是由七位书手为之,书手皆各有其人<sup>[19]</sup>。

### 3. 以脉经为主题的医学研究

李建民认为,马王堆脉书清楚的描述了十一条脉的循行路线,却没有记载一个腧穴名。因而有“先经后穴”的新说出现。然而,解读《五十二病方》中“灸其泰阴、泰阳”之内涵,可以发现太阴、太阳是人体的腧穴名,不是脉名。它们位于人的手足腕踝附近,与经脉一样,亦以三阴三阳命名。根据现存的医学文献,一共有十二个以阴阳命名的腧穴。以阴阳命名的腧穴意义在于,十二阴阳穴是按“时令—三阴三阳—腧穴”的数术图式构思而成的。这样的身体观应被称之为“数术的身体观”<sup>[20]</sup>。陈惠玲认为,目前中医学界对于经脉的形成争论不休,未形成共识。因此,可以从马王堆古医书多种写法的“脉”字入手,分析经脉形成初期与血脉的关系从而为解决争议提供一点参考意见。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可视为经脉形成初期的古脉书,所论及的脉,已具有经脉的特性了。虽古今本与脏腑连接的关系、经脉的走向不完全相同,但可以看到从《马王堆》的古脉书到《黄帝内经·灵枢·经脉》的形成时期,就是血脉与经脉混淆过程的修正。因此,今传本

《黄帝内经》的《经脉》篇中,或为血脉或为经脉的矛盾处,恐怕是过渡时期的一种发展<sup>[21]</sup>。刘澄中认为,马王堆与张家山脉书相继出土之时,正是大陆经脉现象循经感传研究的兴旺时期,90年代又有双包山经脉木人出土。失传了两千多年的循经感传脉学的复活,证实了经脉学说起源于古人观察经脉现象的临床实践。不过,复活了的临床作法,地底下古汉墓中新挖掘出来的《脉书》与“脉人”,流传下来的文字史料,这三者的交织造成了当代大陆经脉史学观点的新冲突<sup>[22]</sup>。

## 三、台湾地区马王堆文化研究的总体特征与研究展望

如上所述,两岸文化同根同源。文化的内在聚合力使台湾地区马王堆汉墓研究呈现出蓬勃的生机。不仅在研究论题上关涉帛书、帛画、葬具等各领域,亦贯穿于哲学、历史、艺术、医学等多学科。其文化研究的总体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台湾地区马王堆文化研究渐趋活跃。历经四十载的学术积淀,台湾地区已经陆续出版了马王堆文化研究专著二十余部,发表了学术论文百余篇,并依托高等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聚集了一大批专业的研究人员,成为马王堆文化研究的重要分支。值得一提的是,有关研究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淡钻研兴趣,反而呈现出更为活跃的迹象。透过台湾华艺线上图书馆,以“马王堆”为关键词检索台湾地区发表的文献可以清晰的发现这一趋势。检索发现,台湾地区发表的相关文献共计69篇,其中上世纪80年代1篇,90年代14篇,2000~2009年33篇,2010年以后21篇。应特别说明的是,2010~2014年仅5年时间就已经发表相关论文21篇,预示着相关研究将更趋活跃。

其次,台湾地区马王堆文化研究的视域与方法不断拓宽、更新。从已经总结出的文献论述中仍可以发现,台湾地区马王堆汉墓研究的进路与方法已经不再拘泥于注、疏、笺、

诂等释文译注方法和易学、黄老学说内容,而是更多的从文化的内在关联中探寻汉文化的历史盛貌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关系,不仅关注文献考据也关注器形艺术,更关注文献的思想内涵。此外,一些高科技研究手段开始引入马王堆文化研究之中。

再者,台湾地区马王堆文化研究凸显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从台湾地区马王堆文化研究的重点来看,易学与黄老学说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主题,而这些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思想基石。在徐复观、严灵峰、陈鼓应等大家的积极宣导下,透过马王堆文化研究,不仅可以更深入的探索马王堆出土器物与人文史料的历史价值,也可以深化台湾地区对中华历史文化的认同,传播悠久的中华文明。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文化的融会与连接推动了两岸中国文化交流合作的展开。1979年马王堆帛书工作会议在美国举行,1988年马王堆医史国际学术会议召开,1990年中华全国首届马王堆医书学术讨论会展开,吸引了一大批台湾学者参与到马王堆文化学术讨论中来,通过辩驳考证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

可以预期的是,未来台湾地区马王堆文化研究仍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随着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困扰台湾学者研究的地域限制将会越来越少,台湾学者会有更多机会参与到马王堆出土文物的实物考证中,并通过搭建两岸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学术的探讨和信息的传播,再加上更多高科技研究手段的运用将会提升各个领域的马王堆文化研究的层次,从而促成马王堆文化繁荣学术局面的出现。

附记:20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医患沟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7YJC880097)项目成果;湖南省社科基金《医患冲突背景下医学伦理教育的检视与重构研究》(15YBA301);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生命与责任:现代医德养成的学校教育研究》

(XJK014CDY012);湖南省社科联课题《和谐医患关系构建视域下医学伦理教育的检视与重构》(JYX165);湖南省中医药文化研究基地课题“儒家哲学对传统医学思维范式的影响研究”。

注释:

- [1]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
- [2]严灵峰:《马王堆帛书易经斟理》,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 [3]李岩:《马王堆帛书与历史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
- [4]检索日期为2015年5月21日。
- [5]王国维:《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出版社,1983年。
- [6]林清源:《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艺文印书馆,2004年。
- [7]林清源:《马王堆帛书〈十大经〉题解》,《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3年第22卷。
- [8]陈清茂:《“马王堆黄老帛书四种”书名相关问题探讨》,《兴大人文学报》2008年第40卷。
- [9]李宗焜:《数字卦与阴阳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6卷。
- [10]郭梨华:《〈经法〉中“形—名”思想探源》,《哲学与文化》,1998年第1期。
- [11]郭梨华:《简、帛〈五行〉的礼乐考述》,《哲学论集》,1999年第32卷。
- [12]范丽梅:《释“弁”与“变”——简帛《五行》多层次的身心书写》,《汉学研究》2014年第1期。
- [13]马耘:《帛书〈道原〉“迴同大虚”解义》,《台北大学中文学报》,2014年第16期。
- [14]曾美云:《帛书〈易说〉思想探析——兼论“子曰”及其相关问题》,《语文学报》2004年第11卷。
- [15]同[8]。
- [16]江柏萱:《马王堆帛书《周易》书法风格特色分析》,《书画艺术学刊》2013年第14卷。
- [17]王忠仁:《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文字特性分析》,《书画艺术学刊》2008年第5卷。
- [18]王忠仁:《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文字结体之造形特性》,《书画艺术学刊》2009年第7卷。
- [19]李宪专:《马王堆帛书医书卷手书的判别》,《书画艺术学刊》2012年第12卷。
- [20]李建民:《明堂与阴阳——以〈五十二病方〉“灸其泰阴泰阳”为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9年第3期。
- [21]陈惠玲:《马王堆汉墓简帛古医书“脉”字考——兼论原始脉观》,《先秦两汉学术》2008年第10卷。
- [22]刘澄中:《大陆经脉史学研究的新检讨——从经脉现象、出土脉书与经脉木人说起》,《新史学》2000年第2期。

(责任编辑、校对:凡国栋)